

# 中国居民家庭的消费趋势及特征

万晓琼 王少龙

**摘要** 为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便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将中国居民家庭依据流动性约束和人均家庭净资产情况分为四类,利用QUAIDS结构方程可以分析中国居民家庭2010-2018年的消费趋势及演化特征。研究发现:第一,2010-2018年四种类型家庭都经历了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升,其中富裕类家庭高收入群体也在增多,富裕和非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消费提升更为明显。第二,中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整体呈现升级态势,但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医疗负担仍然较重。第三,2014-2018年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教育文化的消费占比随市场价格的上涨而增加,表明这些消费缺乏弹性。第四,从支出弹性来看,家庭用品、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表现出“奢侈品”特性,表明中国居民家庭愈加关注生活品质的提升。第五,四种类型家庭中,富裕和非流动性约束的家庭在家庭用品、交通通讯方面的支出弹性更小,而在教育文化方面的支出弹性更大,表明这类家庭也更加注重精神文化需求。因此,政府应致力于稳定提升居民收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度、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的放矢地提振整体居民消费,为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增添动力。

**关键词** 家庭消费结构;收入分布;QUAIDS模型;支出弹性;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 F1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1)03-0119-1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872010)

## 一、引言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速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而有所放缓。自从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发生以来,通过外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也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影响;同时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阶段,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在逐步减弱;而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影响。面对经济发展不稳定、不确定性陡增的局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于2020年5月14日适时提出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发展战略。为了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以及实施“国内大循环”的发展战略,提升居民消费使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对于我国当下以及未来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居民消费的增加不仅可以提高居民家庭的生活福祉,其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也时刻影响着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然而我国居民消费率自从加入WTO后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在主要发展经济体中消费率处于较低水平,虽然近些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有所回升,然而到2019年也仅为38.79%,我国消费率偏低的现象与我国作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的地位明显不符。

针对中国消费率长期偏低的现象,许多专家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大多从借贷约束、预防性储蓄、收入差距、家庭财富与生命周期等角度进行了解释。中国过大的贫富与区域差距、较重的教育医疗负担、

高房价等现实问题都制约着中国居民消费率的提高,因此研究中国居民家庭近些年的消费趋势以及演化特征就极具现实意义,可以根据中国居民家庭的消费特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升中国居民整体消费水平。相关消费理论表明,家庭收入、财富以及不确定性等都能对消费产生较大的影响,我国近2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居民家庭资产快速增多,然而家庭面临的医疗、教育等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相关研究表明流动性资产对于居民家庭消费有明显的平滑作用,所以有必要针对受到不同流动性约束和拥有不同家庭净资产的居民家庭收入、消费等情况展开深入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2014年和2018年的数据,依据家庭流动性约束和人均家庭净资产情况将中国家庭分为四种类型,分析了不同家庭类型的收入、总消费以及近些年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同时使用QUAIDS结构方程对中国近年来的消费特征进行分析,为我国居民消费的提质升级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 二、文献综述

针对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现实情况,相关学者和专家很早就进行了研究。陈彦斌和邱哲圣基于Bewley模型研究发现,较高的房价致使我国居民储蓄、投资行为发生了扭曲,从而降低了城镇居民的福利水平<sup>[1]</sup>(P25-38)。陈斌开研究发现,2000-2008年间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可以由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解释30.8%<sup>[2]</sup>(P33-49)。吕冰洋和毛捷研究了我国高投资和低消费并存现象的财政基础,发现政府给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市场拥挤程度的下降和对消费征税都会使投资消费比上升进而抑制消费<sup>[3]</sup>(P4-18)。许志伟和刘建丰研究了收入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效应和货币政策的稳定作用,研究表明当家庭面临的收入不确定性上升会通过对流动性资产的增持进而减少风险资本的供给,从而导致总需求减少<sup>[4]</sup>(P30-46)。

随着微观数据可得性的增强,从微观层面研究中国居民消费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增多。张大永和曹红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的数据,研究了中国居民家庭房屋价值、金融资产等财富对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同金融资产相比,家庭资产对消费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并且两者都对非耐用品的消费影响更大<sup>[5]</sup>(P53-65)。甘犁等针对中国高储蓄率问题,从流动性约束和收入分布相互作用的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发现流动性约束增强和收入差距扩大会使消费减少从而使家庭总储蓄率升高<sup>[6]</sup>(P34-50)。易行健等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对消费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发现其主要通过缓解居民家庭流动性约束和便利居民支付来促进消费<sup>[7]</sup>(P47-67)。

关于居民消费方面较为经典的理论包括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假说和莫迪利安尼生命周期假说等,表明家庭收入和财产是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后续也有学者从预防性储蓄和缓冲储备理论对消费进行了解释。因此国内外很多学者从家庭资产以及流动性约束等视角研究了居民家庭消费。Kaplan和Violante根据家庭资产数量和流动性资产组合,将美国居民家庭分为贫穷月光族、富裕月光族和非月光族三类,并分析了美国2001年和2008年关于消费刺激政策效果的异质性<sup>[8]</sup>(P1199-1239)<sup>[9]</sup>(P77-138)。臧旭恒和张欣结合流动性约束视角和预防性储蓄视角并根据家庭资产结构划分了不同类型的消费者,以此探讨分析了不同类型消费者行为的差异<sup>[10]</sup>(P21-34)。蒋涛等将中国居民家庭依据流动性资产和非流动性资产情况分为四种类型,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家庭消费—收入弹性和对暂时性收入冲击的反应上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消费特征<sup>[11]</sup>(P133-152)。

以上关于家庭消费方面的文献较多,但是从消费结构方面研究家庭消费的文献则较少。Deaton和Muellbauer提出了几近完美需求系统的经典模型(AIDS)<sup>[12]</sup>(P312-326),后来Banks等学者在AIDS的基础上加入了消费支出的二次项,以刻画其对消费的非线性影响<sup>[13]</sup>(P527-539);Poi在QUAIDS模型中加入家庭特征变量,使之能够容纳更多的信息<sup>[14]</sup>(P37)。

郭晗和任保平基于 AIDS 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 2004-2010 年的消费特征,研究发现食品消费在城乡均体现出必需品特征,农村居民偏好安全型消费,城市居民则偏好享受型消费<sup>[15]</sup>(P45-51)。王志刚和许前军基于嵌入时间路径的 LA/AIDS 模型研究了我国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规律<sup>[16]</sup>(P50-64)。胡日东等通过扩展的 LA/AIDS 模型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显著影响了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sup>[17]</sup>(P75-87)。郑志浩等采用两阶段 QUAIDS 模型估计了 2000-2010 年城镇居民的实物消费与收入的关系,预测表明城镇居民食物支出水平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而不断提高<sup>[18]</sup>(P263-288)。元惠连等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对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老年家庭的医疗保健和中年家庭的子女教育负担较为严重,同时医疗和教育支出的弹性逐渐上升<sup>[19]</sup>(P48-82)。唐琦等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分析了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研究发现 2002-2013 年,家庭消费总量迅速上升的同时消费价格弹性的绝对值也在增加,相比于可支配收入,家庭消费结构更多地受到市场价格的影响,而住房消费占比的不断增加挤占了其他消费。

伴随着中国经济近 20 年的高速增长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居民家庭的资产也在不断地增多,相比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我国社会保障发展较为滞后,居民家庭的教育、医疗、房价等负担依然较重,面对的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因此家庭流动资产在缓解不确定性影响、平滑居民家庭消费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考虑到中国居民家庭所面临的现实情况,参照 Kaplan 和 Violante、蒋涛、甘犁等相关文献关于居民家庭的分类方法,本文将流动性资产是否大于居民家庭两个月收入作为家庭是否受到流动性约束的标准,同时以家庭人均净资产作为划分家庭贫富状况的标准,将中国居民家庭分为贫穷—流动性约束、贫穷—非流动性约束、富裕—流动性约束、富裕—非流动性约束四种类型,同时使用 QUAIDS 模型对中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进行估计,以此分析中国不同类型家庭的消费趋势及变化特征,深化关于中国居民家庭消费的研究范围。

### 三、消费结构估计方法

本文基于 QUAIDS 模型对家庭消费结构进行估计,接下来对 QUAIDS 结构方程及其应用原理作简要分析。

#### (一) 近似理想需求系统模型(AIDS)

Deaton 和 Muellbauer 从独立于价格的一般对数形式(PIGLOG)的支出函数出发,提出了家庭需求新的模型:

$$\ln[c(u,p)]=(1-u)\ln[a(p)]+u\ln[b(p)] \quad (1)$$

给定效用  $u$  和价格向量  $p$  不变时的最低支出函数为  $c(u,p)$ ,效用  $u \in (0,1)$  之间, $a(p)$  和  $b(p)$  分别表示最低和最高的效用水平的支出状态。根据谢波德(Shepherd)引理,近似理想的需求系统(AIDS 模型)为:

$$w_i = \alpha_i + \sum_j \gamma_{ij} \ln p_j + \beta_i \ln \left[ \frac{m}{a(p)} \right] \quad (2)$$

公式(2)中, $w_i$  表示第  $i$  种商品的支出份额, $p_j$  为第  $j$  种商品的价格, $m$  是消费总支出, $\alpha_i$ 、 $\gamma_{ij}$  及  $\beta_i$  是待估参数。 $\gamma_{ij}$  为当实际支出不发生变化时第  $i$  种商品的支出份额受到第  $j$  种商品价格变化率的影响程度。 $\beta_i$  表示当消费品价格保持不变时,第  $i$  种商品的支出份额由实际支出变化引起的变化程度。

#### (二) 包含支出二次项的需求模型(QUAIDS)

Banks 等学者在 AIDS 基础上将支出的二次项纳入了需求模型(Quadratic AIDS,简称 QUAIDS),此模型能够刻画支出对数的二次项对消费份额的非线性影响。QUAIDS 模型中其效用函数  $V$ :

$$\ln V(p, m) = \left[ \frac{\ln m - \ln a(p)}{b(p)} \right]^{-1} + \lambda(p) \quad (3)$$

公式(3)中  $m$  为家庭总消费支出,  $p$  为支出项的各类价格向量;  $a(p)$  是综合价格指数,  $\ln a(p) = \alpha_0 + \sum_i \alpha_i \ln p_i + \frac{1}{2} \sum_i \sum_j \gamma_{ij} \ln p_i \ln p_j$ ,  $b(p)$  为科布一道格拉斯价格加总,  $b(p) = \prod_{i=1}^k p_i^{\beta_i}$ ,  $\lambda(p)$  是价格  $P$  的零阶齐次函数,  $\lambda(p) = \sum_{i=1}^k \lambda_i \ln p_i$ , 通过 Roy 恒等式可得到 QUAIDS 模型形式为:

$$w_i = \alpha_i + \sum_j \gamma_{ij} \ln p_j + \beta_i \ln \left[ \frac{m}{a(p)} \right] + \frac{\lambda_i}{b(p)} \left\{ \ln \left[ \frac{m}{a(p)} \right] \right\}^2 \quad (4)$$

其中,  $\alpha_i, \gamma_{ij}, \beta_i, \lambda_i$  为待估计参数。

### (三) 包含家庭特征的 QUAIDS

Ray 的需求模型将家庭特征纳入进来<sup>[20]</sup>(P89-102), Poi 在 QUAIDS 的基础上纳入家庭特征函数以刻画家庭特征对于消费的影响。

$$e(p, z, u) = m_0(p, z, u) \times e^R(p, u) \quad (5)$$

$$m_0(p, z, u) = \overline{m_0}(z) \times \varphi(p, z, u) \quad (6)$$

公式(5)  $e^R(p, u)$  表示不包含家庭特征的家庭支出函数。在公式(6)中,  $m_0(p, z, u)$  是家庭特征函数,  $\overline{m_0}(z)$  表示家庭随人数变化而变化的支出;  $\varphi(p, z, u)$  表示由家庭特征引起的价格、消费的变化。根据 Ray 的研究,  $\overline{m_0}(z)$  和  $\ln \varphi(p, z, u)$  分别为:

$$\overline{m_0}(z) = 1 + \rho'z \quad (7)$$

$$\ln \varphi(p, z, u) = \frac{\prod_j p_j^{\beta_j} (\prod_j p_j^{\eta_j z} - 1)}{\frac{1}{u} - \sum_j \lambda_j \ln p_j} \quad (8)$$

用罗伊(Roy)恒等式可得到家庭消费需求为:

$$w_i = \alpha_i + \sum_j \gamma_{ij} \ln p_j + (\beta_i + \eta'_j z) \ln \left[ \frac{m}{\overline{m_0}(z) a(p)} \right] + \frac{\lambda_i}{b(p) c(p, z)} \left\{ \ln \left[ \frac{m}{\overline{m_0}(z) a(p)} \right] \right\}^2 \quad (9)$$

公式(9)中  $c(p, z) = \prod_j p_j^{\eta_j z}$ ; 包含家庭特征的家庭需求模型与 QUAIDS 有一样的弹性计算方法。

商品  $i$  的支出弹性为:

$$e_i = 1 + \frac{1}{w_i} \left\{ \beta_i + \eta'_j z + \frac{2\lambda_i}{b(p) c(p, z)} \ln \left[ \frac{m}{\overline{m_0}(z) a(p)} \right] \right\} \quad (10)$$

商品  $i$  对商品  $j$  的马歇尔价格弹性为:

$$e_{ij} = -\delta_{ij} + \frac{1}{w_i} \left( r_{ij} - \left\{ \beta_i + \eta'_j z + \frac{2\lambda_i}{b(p) c(p, z)} \ln \left[ \frac{m}{\overline{m_0}(z) a(p)} \right] \right\} \right) \times \left( \alpha_i + \sum_l \gamma_{il} \ln p_l \right) - \frac{(\beta_j + \eta'_j z) \lambda_i}{b(p) c(p, z)} \left\{ \ln \left[ \frac{m}{\overline{m_0}(z) a(p)} \right] \right\}^2 \quad (11)$$

其中,  $\delta_{ij}$  为克罗内克  $\delta$  函数(Kronecker Delta), 待回归参数为  $\alpha_i, \gamma_{ij}, \beta_i, \eta'_j, \rho', \lambda_i$ 。通过斯卢斯基方程可得商品  $i$  的希克斯价格弹性( $e_{ij}^H$ ):  $e_{ij}^H = e_{ij} + e_i w_j$ 。

## 四、数据处理与相关统计性描述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及特征的变化, 接下来对数据来源、数据处理过程进行阐述, 并对我国居民家庭收入、消费等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

### (一) 数据来源和处理过程

本文的研究数据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负责调查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中(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简称CFPS)2010年、2014年、2018年的数据。CFPS数据中有关居民家庭消费的划分与国家统计局分类一致,将居民家庭消费划分为食品、衣着、居住、家庭用品、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和其他消费共计八类消费。

数据和变量处理过程如下:按照家庭编号将历年家庭成员数据库和家庭经济数据库进行了匹配;剔除了家户编码与省份变量不一致的家户数据;剔除了八大类消费支出、家庭纯收入数据缺失的家户数据;剔除食品年支出低于国家贫困户的人均每年食品消费额和户主年龄小于16岁的家户数据;对于八大类消费中的0值,依据CFPS数据按照年份和省份分类计算出的家庭人均八大类消费,然后乘以家庭人口数予以填充;将历年的消费和收入分省份分城乡调整到了2010年的人民币购买力水平;将流动性资产净值是否大于家庭2个月的收入来判断家庭是否受到流动性约束,然后根据人均家庭净资产来划分贫穷和富裕家庭,将前40%的家庭划分为贫穷家庭,其余家庭为富裕家庭,由此划分出贫穷—流动性约束(类型1:25.56%)、贫穷—非流动性约束(类型2:14.46%)、富裕—流动性约束(类型3:23.60%)、富裕—非流动性约束(类型4:36.38%)四类家庭,共计50976个家庭样本。

## (二) 统计描述

基于以上处理后的数据,本文对历年家庭收入、不同收入分位点上的总消费以及八大类消费进行统计描述,以反映我国家庭收入、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

1. 不同类型家庭的历年收入分布。在图1中<sup>①</sup>,从不同类型家庭的历年收入分布情况来看,不同类型的家庭都经历了收入水平的提升,2010-2018年低收入家庭明显减少,收入分布更多体现出厚尾特征,表明中高收入水平的家庭在不断增多,特别是2014-2018年类型3和类型4家庭里高收入家庭分布明显增多;而且2014年和2018年类型3家庭和类型4家庭的收入分布表现出两头大的特征,也从侧面反映出在相对富裕家庭其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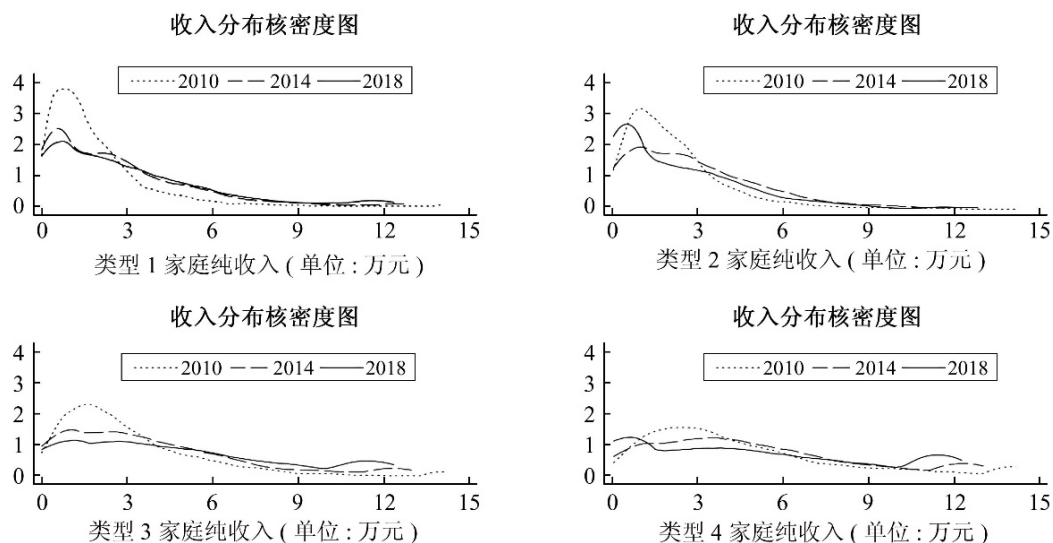


图1 四种类型家庭收入分布图

2. 不同类型家庭的历年总消费情况。从图2可以看出<sup>②</sup>,2010-2018年不同类型的家庭总消费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多,整体上也呈现出消费水平上升的趋势。而在四类家庭中,相比于类型1和类型2家庭,类型3和类型4家庭的整体消费水平明显更高。并且从图2中可以看出,类型1和类型2家庭在

① 图1—图3是作者基于2010年、2014年、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所画。

② 图2—图3是作者将家庭纯收入分为20个组,根据每个小组相关均值所画。

2014-2018年整体消费提升不是很明显,表明贫穷家庭其消费行为仍然受到较大约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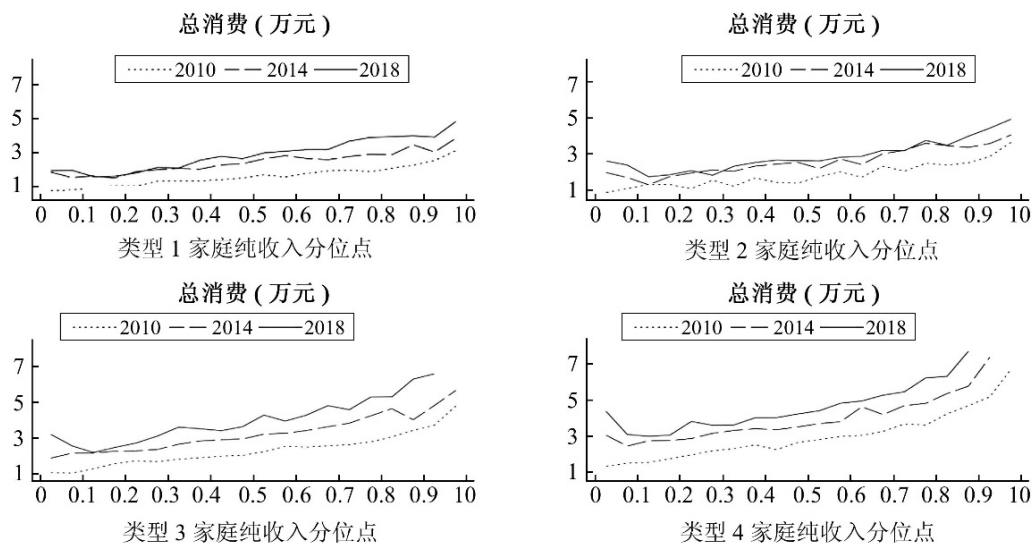


图2 四种类型家庭历年总消费情况

3. 历年八大类消费占比情况。从图3中可以看出,2010-2018年食品消费占比呈现逐年下降态势,然而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食品消费占比并没有表现出下降的趋势,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收入的提高,一些之前对家庭来说属于奢侈品的食品消费进入家庭消费。衣着消费占比在2010-2014年间上升,而在2014-2018年间逐渐下降,但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都呈现逐渐上升趋势,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更加注重提升生活品质。居住消费占比在2010-2018年间大幅度上升,从2010年的5%左右上升到2018年的15%以上;2014和2018年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上升,居住消费占比呈现下降趋势,表明中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消费负担较重。家庭用品消费占比从2010-2018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趋势,但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用品消费占比也逐渐增大,表明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人们开始注重生活质量的提升。医疗保健消费占比从2010-2018年间逐渐表现出下降的态势,并且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占比在不断下降,一方面表明我国医改成果较好,减少了整体居民家庭的医疗负担,另一方面也表明中低收入家庭仍然承受较大的医疗负担。交通通讯消费占比除了2010年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呈现增大的趋势外,其余年份并没有表现出一定的变化规律,同时2014年和2018年的占比也变化不大。教育文化消费占比从2010-2014年间呈现小幅下降态势,而2014-2018年消费占比变化不大,在不同收入的家庭间并没有表现出一定的趋势,因为教育支出对于家庭来说属于刚性支出,因此其占比变化不大。其他消费占比在2010-2018年间并没有表现出上升或下降的趋势。

## 五、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实证分析主要有三部分:首先是基于QUAIDS对历年家庭八大类消费占比进行了估计;其次基于QUAIDS估计结果计算出历年八大类消费的支出弹性;最后通过对比历年四类家庭八大类消费品支出弹性总结家庭在消费支出弹性方面的变化特征。

### (一) QUAIDS模型回归结果

基于QUAIDS模型估计消费品价格对中国居民家庭八大类消费占比的影响,同时将户主年龄、成年人数量和孩子数量等家庭特征加入QUAIDS模型,可刻画其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1—表3所示。从表1—表3可见,2010年除食品和其他消费占比会随着自身价格的上涨而减小外,其余消费占比对于自身价格的变动并不敏感。2014年和2018年食品、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教育文化消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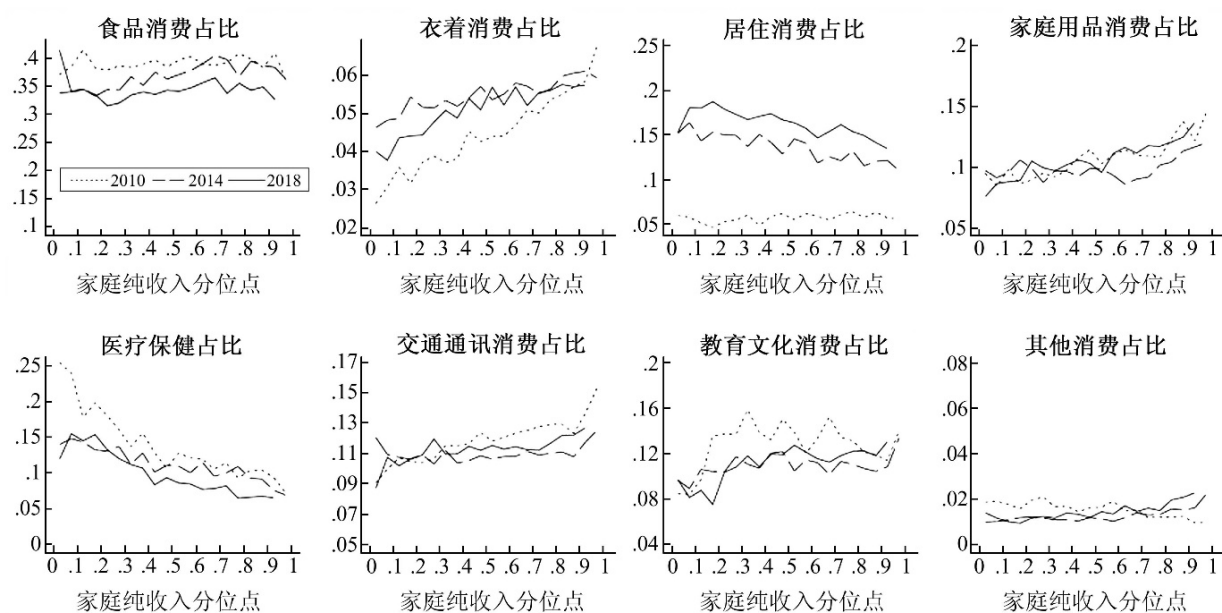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收入分位点上家庭八类消费的占比

占比随着自身价格的上涨而在支出中占比增加,表明这些消费缺乏弹性;居住消费占比则随着居住价格的上升而下降,可能是因为房价的快速上涨使一些本来打算买房的人延迟买房所致。

就家庭支出而言,2010-2018年随着支出的增加,食品、家庭用品、医疗保健消费占比同向增加,而交通通讯和其他消费占比则逆向减少,一是表明中国居民家庭更加注重生活品质的提升,二是表明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在交通通讯方面的支出占比不断下降。支出对于居住消费占比的影响在2010年显著为负,而在2014年和2018年显著为正,表明随着支出的增加,居住占比也在不断增加;而支出对于教育文化的影响与居住刚好相反,表明由于房价的上涨可能使中国居民家庭教育文化的支出占比有所下降。

就户主年龄来看,随着户主年龄增加,2010年、2014年和2018年食品、衣着、交通通讯、其他消费略有增加,家庭用品、医疗保健消费则略有减少。2010年户主年龄对居住消费影响为正,到2014年和2018年对居住消费影响不显著。户主年龄对教育文化在2010年和2014年的影响显著为负,而2018年虽然系数很小,但显著为正,也表明随着户主年龄增长,教育文化消费需求增加。

2010年、2014年和2018年随着家庭成年人数的增多,食品、交通通讯消费略有减少,教育文化则随着家庭成年人数的增多略有增加。2010年家庭成年人数对于家庭用品、医疗保健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在2014和2018年对家庭用品、医疗保健的影响显著为正,反映出了家庭对于生活品质提升的追求。孩子数量在2010年对食品、居住、家庭用品、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等消费的影响显著为正,对衣着、教育文化、其他消费影响显著为负。而在2014和2018年孩子数量对很多消费影响不再显著。而家庭孩子数量对教育文化在2010年和2014年的影响显著为负,而2018年则显著为正,反映出居民家庭对孩子教育的重视,在教育支出上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多而增加。

## (二) 各类消费的支出弹性

根据商品的支出弹性定义,当商品为奢侈品时,其支出弹性大于1;当商品为必需品时,其支出弹性小于1,表4是历年八类消费的支出弹性。从表4可见,食品的支出弹性在2010年大于1,表现出奢侈品特性,而在2014年和2018年的支出弹性小于1,表现出必需品特性。衣着的支出弹性在2010-2018年都大于1,2014年支出弹性有所增大而在2018年支出弹性有所减小,总体上表现出奢侈品的特性。2010年居住的支出弹性为负,而2014年和2018年支出弹性均小于1,居住消费表现出必需品的特性。家庭用品支出弹性在2010-2018年都大于1,并且弹性有所下降,表明家庭用品的“奢侈度”在下降,表明

表1 2010年家庭数据估计结果

| 2010年  | 食品        | 衣着        | 居住        | 家庭用品      | 医疗保健      | 交通通讯      | 教育文化      | 其他        |
|--------|-----------|-----------|-----------|-----------|-----------|-----------|-----------|-----------|
| 食品价格   | -0.806*** | 0.098***  | -0.114*   | 0.095*    | -0.135*** | 0.420**   | 0.142**   | 0.300***  |
| 衣着价格   | 0.098***  | 0.005     | 0.067***  | 0.056     | -0.221*** | -0.010    | -0.115*** | 0.120***  |
| 居住价格   | -0.114*   | 0.067***  | 0.092     | 0.100**   | 0.037     | -0.141**  | -0.129**  | 0.088*    |
| 家庭用品价格 | 0.095*    | 0.056     | 0.100**   | 0.166     | -0.282*** | -0.139**  | 0.141**   | -0.137*** |
| 医疗保健价格 | -0.135*** | -0.221*** | 0.037     | -0.282*** | 0.055     | 0.168***  | 0.155**   | 0.224***  |
| 交通通讯价格 | 0.420**   | -0.010    | -0.141**  | -0.139**  | 0.168***  | -0.012    | -0.267*** | -0.020    |
| 教育文化价格 | 0.142**   | -0.115*** | -0.129**  | 0.141*    | 0.155**   | -0.267*** | -0.082    | 0.154***  |
| 其他价格   | 0.300***  | 0.120***  | 0.088*    | -0.137*** | 0.224***  | -0.020    | 0.154***  | -0.730**  |
| 支出     | 0.022***  | 0.003     | -0.106*** | 0.044***  | 0.058***  | -0.037*** | 0.066***  | -0.050*** |
| 支出二次项  | 0.019***  | 0.002**   | -0.017*** | 0.018***  | 0.012***  | -0.005*   | -0.034*** | 0.006***  |
| 户主年龄   | 0.000***  | 0.000***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0***  |
| 成年人数   | -0.019*** | 0.000     | 0.011***  | -0.004*** | -0.001*   | -0.005*** | 0.017***  | 0.003***  |
| 孩子人数   | 0.014***  | -0.002*** | 0.006***  | 0.008***  | 0.007***  | 0.005*    | -0.035*** | -0.003*** |
| 截距项    | 0.333***  | 0.045***  | 0.179***  | 0.081***  | 0.088***  | 0.074***  | 0.141***  | 0.059***  |

注:\*\*\*、\*\*、\*分别表示1%、5%、10%显著性水平,因变量为八大类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

表2 2014年家庭数据估计结果

| 2014年  | 食品        | 衣着        | 居住        | 家庭用品      | 医疗保健      | 交通通讯      | 教育文化      | 其他        |
|--------|-----------|-----------|-----------|-----------|-----------|-----------|-----------|-----------|
| 食品价格   | 0.436***  | -0.036**  | 0.214***  | 0.074***  | -0.042*   | -0.248*** | -0.418*** | 0.020     |
| 衣着价格   | -0.036**  | 0.084***  | 0.016     | -0.017    | -0.054*** | -0.011    | 0.002     | 0.017*    |
| 居住价格   | 0.214***  | 0.016     | -0.350*** | -0.090*** | -0.078*** | 0.134***  | 0.169***  | -0.015    |
| 家庭用品价格 | 0.074***  | -0.017    | -0.090*** | 0.044     | 0.045**   | -0.159*** | 0.075***  | 0.027***  |
| 医疗保健价格 | -0.042*   | -0.054*** | -0.078*** | 0.045**   | 0.168***  | 0.033     | -0.091*** | 0.019     |
| 交通通讯价格 | -0.248*** | -0.011    | 0.134***  | -0.159*** | 0.033     | 0.195***  | 0.034     | 0.021     |
| 教育文化价格 | -0.418*** | 0.002     | 0.169***  | 0.075***  | -0.091*** | 0.034     | 0.255***  | -0.026**  |
| 其他价格   | 0.020     | 0.017*    | -0.015    | 0.027***  | 0.019     | 0.021     | -0.026**  | -0.063    |
| 支出     | 0.068***  | -0.001    | 0.022***  | 0.038***  | 0.008**   | -0.078*** | -0.050*** | -0.008*** |
| 支出二次项  | -0.023*** | 0.006***  | -0.004*   | 0.009***  | 0.005***  | -0.015*** | 0.015***  | 0.007***  |
| 户主年龄   | 0.001***  | 0.000***  | 0.000     | -0.001*** | -0.001*** | 0.002***  | -0.001*** | 0.000***  |
| 成年人数   | -0.010*** | 0.000     | 0.001     | 0.006***  | 0.004***  | -0.004*** | 0.003***  | 0.000     |
| 孩子人数   | 0.003*    | 0.000     | -0.001    | 0.001     | 0.001     | -0.002    | -0.003*   | 0.000     |
| 截距项    | 0.224***  | 0.068***  | 0.079***  | 0.067***  | 0.123***  | 0.156***  | 0.260***  | 0.022***  |

注:\*\*\*、\*\*、\*分别表示1%、5%、10%显著性水平,因变量为八大类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

一些之前属于奢侈品范畴的商品逐渐变为生活必需品,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升级。医疗保健支出弹性在2010-2018年都大于1,并且弹性呈现下降态势,随着医疗改革的不断深入,更多的居民家庭享受到医疗保障,因此其支出弹性有所下降。交通通讯支出弹性一直呈现下降态势,在2010年小于1,而在2014-2018年却小于0,表明随着技术的升级,交通通讯成本在迅速下降,因此可能随着家庭支出的增多,交通通讯支出反而在减少。教育文化支出弹性在2010年为负,而在2014-2018年间为正,并且支出弹性在增大,表明随着家庭支出的增多,中国居民家庭在教育文化上消费越来越多,表现出教育文化的“奢侈品”特性,也表现出中国居民家庭越来越重视教育的特征。

### (三) 不同家庭的支出弹性分析

表4反映了中国居民家庭历年的消费支出弹性,图4-图6反映了不同类型家庭的历年消费支出弹性,总体上看,不同类型家庭支出弹性与总体消费支出弹性相差不大,在某几类消费上四类家庭消费的支出弹性有较明显的差异。

表3 2018年家庭数据估计结果

| 2018年  | 食品        | 衣着        | 居住        | 家庭用品      | 医疗保健      | 交通通讯      | 教育文化      | 其他        |
|--------|-----------|-----------|-----------|-----------|-----------|-----------|-----------|-----------|
| 食品价格   | 0.382***  | -0.045*** | 0.056**   | -0.058*** | -0.023*   | -0.093*** | -0.207*** | -0.012**  |
| 衣着价格   | -0.045*** | 0.007     | 0.046***  | -0.012    | -0.026*** | 0.016***  | 0.021**   | -0.005    |
| 居住价格   | 0.056**   | 0.046***  | -0.098*** | 0.002     | -0.067*** | 0.046***  | 0.011     | 0.005     |
| 家庭用品价格 | -0.058*** | -0.012    | 0.002     | 0.037     | 0.012     | -0.069*** | 0.074***  | 0.014**   |
| 医疗保健价格 | -0.023*   | -0.026*** | -0.067*** | 0.012     | 0.195***  | -0.008    | -0.078*** | -0.005    |
| 交通通讯价格 | -0.093*** | 0.016***  | 0.046***  | -0.069*** | -0.008    | 0.033*    | 0.066***  | 0.010***  |
| 教育文化价格 | -0.207*** | 0.021**   | 0.011     | 0.074***  | -0.078*** | 0.066***  | 0.127***  | -0.015*** |
| 其他价格   | -0.012**  | -0.005    | 0.005     | 0.014**   | -0.005    | 0.010***  | -0.015*** | 0.009     |
| 支出     | 0.080***  | 0.005**   | 0.012**   | 0.039***  | 0.013***  | -0.067*** | -0.079*** | -0.003*** |
| 支出二次项  | -0.021*** | 0.003***  | -0.009*** | 0.008***  | 0.004***  | -0.016*** | 0.026***  | 0.005***  |
| 户主年龄   | 0.001***  | 0.000***  | 0.000     | -0.001*** | -0.001*** | 0.002***  | 0.000***  | 0.000***  |
| 成年人数量  | -0.009*** | 0.000     | -0.003*** | 0.005***  | 0.005***  | -0.005*** | 0.007***  | 0.000     |
| 孩子数量   | 0.001     | 0.000     | -0.002*   | 0.001     | 0.000     | -0.004*** | 0.003**   | 0.000     |
| 截距项    | 0.217***  | 0.063***  | 0.144***  | 0.091***  | 0.128***  | 0.132***  | 0.204***  | 0.021***  |

注：\*\*\*、\*\*、\*分别表示1%、5%、10%显著性水平，因变量为八大类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

表4 八类消费历年支出弹性

| 年份    | 食品    | 衣着    | 居住     | 家庭用品  | 医疗保健  | 交通通讯   | 教育文化   | 其他    |
|-------|-------|-------|--------|-------|-------|--------|--------|-------|
| 2010年 | 1.693 | 1.232 | -0.585 | 3.163 | 2.310 | 0.770  | -1.140 | 1.791 |
| 2014年 | 0.514 | 1.856 | 0.843  | 2.427 | 1.455 | -0.395 | 1.651  | 4.839 |
| 2018年 | 0.595 | 1.341 | 0.175  | 2.274 | 1.419 | -0.510 | 2.518  | 3.768 |

2010年食品、居住、家庭用品和教育文化的支出弹性随着流动性约束的减少和家庭富裕程度的增加在不断减少。而食品、家庭用品支出弹性在四类家庭中都大于1,表明对于四类家庭来说都属于“奢侈品”,然而随着流动性约束和富裕程度的减少,其奢侈度有所下降。而居住和教育文化的支出弹性则为负值,表明越富有和越不受流动性约束的家庭其支出增多后,居住消费和教育文化的支出则呈现减少的趋势,并且类型4家庭在居住和教育文化上的支出随着总支出的增多,减少的程度更大。

2014年和2018年,家庭用品、交通通讯的支出弹性随流动性约束的减少和家庭富裕程度的增加在不断减少,表明家庭用品对于富裕—非流动性约束的家庭其“奢侈度”有所减小;而交通通讯的支出弹性是负值,且2014-2018年其支出弹性有下降态势。教育文化的支出弹性则随着流动性约束的减少和家庭富裕程度的增加在不断增加,并且2014-2018年其支出弹性有上升的态势,表明随着总支出增加,教育文化支出增加更大。从2014年和2018年交通通讯和教育文化两类支出弹性看,随着流动性约束的减少和富裕程度的增加,交通通讯支出的下降可能更多地用于教育文化类支出和其他消费品的支出。

## 六、结 论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了中国居民家庭2010-2018年收入、消费以及消费结构和支出弹性的变化,发现从整体上看四种类型家庭低收入群体在逐年减少,中高收入群体有所扩大,但富裕型家庭里高收入群体也在增多,反映出我国居民家庭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从消费层面看,2010-2018年不同类型家庭消费水平都有所提升,相比于贫穷家庭,富裕家庭消费提升更明显。

从八大类消费来看,中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整体上呈现升级态势,但生存型消费中居住消费占比逐年增加,并且中低收入家庭居住消费占比更高,反映出我国居民家庭仍然有较重的居住支出负担;对中低收入家庭来说,虽然发展型消费逐年下降,但其医疗负担仍然较重;享受型消费家庭用品和交通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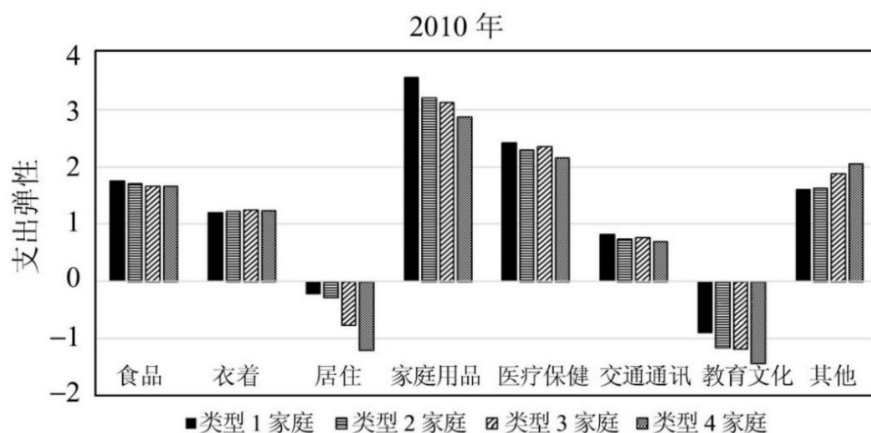


图 4 2010 年四种类型家庭八大类消费支出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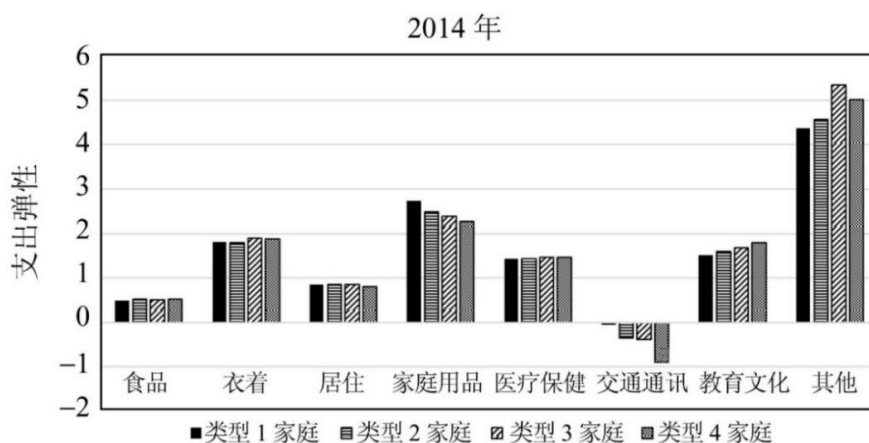


图 5 2014 年四种类型家庭八大类消费支出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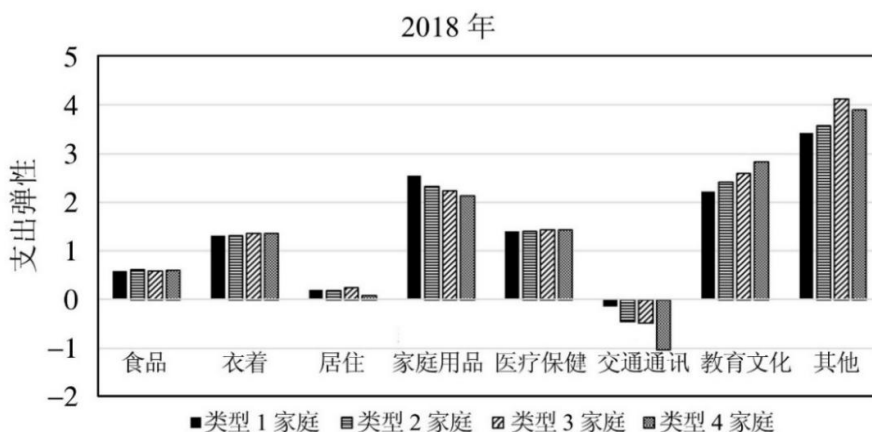


图 6 2018 年四种类型家庭八大类消费支出弹性

讯的消费占比则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多而增加,表明中国居民家庭消费的升级更多体现在中高收入家庭。

QUAIDS 分析结果表明,2014-2018 年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教育文化的消费占比随着自身价格的上涨而增加,表明这些消费缺乏弹性。同时户主年龄、家庭的成年人人数和孩子数对于八大类消费占比

也产生了较显著的影响。从支出弹性来看,衣着、家庭用品、医疗保健的支出弹性都大于1,且教育文化的支出弹性从2010年的负值转变为2014年和2018年的正值,并且都大于1,这也表明近些年我国居民家庭在教育、文化上的支出增多,反映出人们逐渐注重生活品质的提升。居住消费的支出弹性在2014年和2018年小于1,表现出房子对于居民家庭而言的必需品特性。

分家庭类型来看,四类家庭主要在家庭用品、教育文化、交通通讯支出弹性上表现出差异性,2014年和2018年教育文化支出弹性大于1,且随着家庭富裕程度的增加和流动性约束的减少,支出弹性在增大;而家庭用品支出弹性在2010年、2014年和2018年都随着富裕度和流动性约束的减少而减少,但也都大于1,表明中国居民家庭在追求物质生活时也更加追求精神生活,同时越富有和越不受流动性约束的家庭在教育文化方面消费更多,反映出中国居民家庭的消费升级在富裕家庭中表现更为明显。

根据上文分析,建议采取以下针对性措施提高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从而提升中国整体消费率:

第一,继续以提高居民收入为政策着力点。分析表明居民消费受到收入的影响较为明显,国家应该继续稳步提高中等收入家庭占比,同时注意防范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以提升中国整体居民消费率。第二,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努力扩大社会保障覆盖深度。相比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在收入提高时有更高的消费倾向,而中国这一类居民家庭当前仍然面临较大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负担,因此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给予这类家庭住房、教育补贴,同时进一步降低其医疗负担,降低这一类家庭面临的不确定性影响,从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第三,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消费方面的供给。从上文可知,近些年中国居民家庭在家庭用品、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上的支出弹性较大,表明中国居民对这几类消费需求依然旺盛,可以出台相关政策促使这几类消费产品的供给升级,进而增加居民消费,实现中国居民消费的提质升级,使消费早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综上所述,政府应该在稳步提升居民收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度以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继续发力,使我国居民家庭在收入提高的同时减轻其生活负担,使其敢于消费、乐于消费,以提升我国的整体居民消费率,加快推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 参考文献

- [1] 陈彦斌,邱哲圣.高房价如何影响居民储蓄率和财产不平等.经济研究,2011,(10).
- [2] 陈斌开.收入分配与中国居民消费——理论和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12,(1).
- [3] 吕冰洋,毛捷.高投资、低消费的财政基础.经济研究,2014,(5).
- [4] 许志伟,刘建丰.收入不确定性、资产配置与货币政策选择.经济研究,2019,(5).
- [5] 张大永,曹红.家庭财富与消费: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经济研究,2012,(S1).
- [6] 甘犁,赵乃宝,孙永智.收入不平等、流动性约束与中国家庭储蓄率.经济研究,2018,(12).
- [7] 易行健,周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金融研究,2018,(11).
- [8] Greg Kaplan, Giovanni L. Violante. A Model of the Consumption Response to Fiscal Stimulus Payments. *Econometrica*, 2014, 82(4).
- [9] Greg Kaplan, Giovanni L. Violante, Justin Weidner. The Wealthy Hand-to-Mouth.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14, (1).
- [10] 臧旭恒,张欣.中国家庭资产配置与异质性消费者行为分析.经济研究,2018,(3).
- [11] 蒋涛,董兵兵,张远.中国城镇家庭的资产配置与消费行为:理论与证据.金融研究,2019,(11).
- [12] Angus Deaton, John Muellbauer. 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 70(3).
- [13] James Banks, Richard Blundell, Arthur Lewbel. Quadratic Engel Curves and Consumer Demand.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7, 79(4).
- [14] 唐琦,夏庆杰,李实.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分析:1995-2013.经济研究,2018,(2).
- [15] 郭晗,任保平.基于AIDS模型的中国城乡消费偏好差异分析.中国经济问题,2012,(5).
- [16] 王志刚,许前军.探索农村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变规律——一个嵌入时间路径的LA/AIDS模型的应用.数量经济技术经

- 济研究,2012,(1).
- [17] 胡日东,钱明辉,郑永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LA/AIDS拓展模型的实证分析.财经研究,2014,(5).
- [18] 郑志浩,高颖,赵殷钰.收入增长对城镇居民食物消费模式的影响.经济学(季刊),2016,(1).
- [19] 元惠连,夏庆杰,王小林.基于QUAIDS模型的中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实证分析.劳动经济研究,2017,(4).
- [20] Ranjan Ray. Measuring the Costs of Children: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83,22(1).

## Consumption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Households

Wan Xiaojiong(Information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Wang Shaolong(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ycle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improvement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level has become a focus of the current economic work. Based on Chinese household tracking (CFPS) survey data, Chinese households ar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liquidity constraints and per capita net assets, and the consump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trends of Chinese households from 2010 to 2018 were analyzed by using QUAIDS structural equ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four types of households have experienced an improvement of income and consumption level from 2010 to 2018, in which the high-income groups of wealthy families also increased and the increase in consumption of wealthy and illiquid households was more obvious. Second, the overall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Chinese households is upgrading, but the housing and medical burden of low-and middle-income families is still heavy. Third, the proportion of consumption of health care, transportation, communications, education and culture from 2014 to 2018 increased with the rise of their own prices, indicating that these consumptions are inflexible. Four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enditure elasticity, household goods, health care, education and culture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uxury", indicating that Chinese famili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Fifth, among the four types of families, wealthy and non-liquidity constraints families are less flexible in household goods,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but are more flexible in education and culture, indicating that these families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ive to steadily increase residents' income, expand social security coverage, deepen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boost overall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a targeted manner, so as to add impetus to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ycle development pattern.

**Key words** household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come distribution; QUAIDS model; price and expenditure elasticit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ycle development pattern

---

■ 收稿日期 2021-03-19

■ 作者简介 万晓琼,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应用经济学科执行主编;北京 100872;  
王少龙(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李媛